

到明代去“露营”吧

明代士人多有“游癖”

“途利文具匣一，内藏裁刀、锥子、挖耳、挑牙、消息，又修指甲刀、锉、发刷等件。酒牌一，诗韵牌一，文诗筒一；内藏红叶或笺以录诗。下藏梳具匣者，以便山宿。外用关锁以启闭。携之山游，似亦甚备。”明代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，列出为山游夜宿准备的用品。其中“消息”是掏耳的，“以禽鸟毛翎安于竹针头，用以取耳垢者，俗呼为消息”。明代士人出行用度之精致可见一斑。晚明士人多以“游癖”自诩。张岱

称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”，王阳明诗“平生山水已成癖”。袁宏道《西湖游记》、王世贞《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》、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此类的游记小品，又有《徐霞客游记》、《广志绎》这般的宏篇巨献，可见证明人游兴之盛。明代士人的“游癖”特别在“造物”上。他们不再贬斥匠工，身体力行，把

“风雅”注入寻常器具之中。

沈束得罪严嵩，在狱十八年，以琢磨文玩为乐。“旁攻匠艺，无斧锯，以片铁日夕磨之，遂铄利。得香楠尺许，琢为文具一，大匣三、小匣七、壁锁二；棕竹数片，为簞（扇）一，为骨十八，以笋、以缝、以键，坚密肉好，巧匠谢不能事”。传说梅湖仙人以梅为筏，钱塘黄

汝亨以竹造船，名为“浮梅槛”，又遍邀名士题咏，汇编成集，如汤显祖有句记之“黄郎新泛竹为编”。其儿媳顾若璞特造“读书船”，课子黄灿读书其中，黄灿成年后又造“破浪”并自号“破浪船子”，黄家诗文世代传承。更遑论明代还出了明熹宗这样的木工皇帝。《明宫杂咏》有诗：“御制十灯屏，司农不患贫。沈香刻寒雀，论价十万缗。”

如何让露营拉满“氛围感”？明代人开发了不少户外生活黑科技。

明代出游都组队

《论语》中记孔子出游，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算组团了。宋代沈括《忘怀录》建议：“游山客不可多，多则应接人事劳烦，有妨静赏。”最好带三个仆人，“令为三人具诸应用，共物为两扇，二人荷之，操几杖持，盖杂使更三人足矣”。明人出游，如王世贞的《张公洞记》，袁宏道的《游盘山记》等述，一般不超过六人。要想

玩得舒坦，肯挑担子的不能少。

徐霞客一路多雇佣差夫，有时四人，最多时六人。行李重，一个担子不够，要用“二肩舆”。徐霞客在日记中，总写到了某地要“换夫”，最多一天写了四次“换夫”。他还随身携带家传之宝《晴山帖》六册，一路与友人共赏。

明人出游什么打扮？穿野服。据张丑《野服考》，一套野服包括苔笠缁撮、鹿裘带索、草履、草裳、短褐、斗笠、蓑衣、纶竿、芒鞋、竹杖、柴担、耒耜等。想来一个个就像“诸葛村夫”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八回，嘉靖时娄家两公子去拜见蘧太守，“太守也换了葛

巾野服拄著天台藤杖出来陪坐。”文人精神在达与隐中切换，换身衣服拄根棍就能实现了，这才是“装”的正解。

陆游得了一根老藤杖，吟诗“我有古藤杖，夭矫蛟龙形”。不过天台红藤杖才是他心中好：“明朝欲入天台去，试就高人乞一支。”徐霞客游天台山时曾费工夫在天台上找过万年藤。

吴敬梓想要天台藤竹仗，“一杖需数十金”，如买下“时或至于绝粮”。

提盒里面有乾坤

《广志绎》中说，明代北京人好游，清明踏青，“高梁桥盘盒一望如画图”。清代《燕京岁时记》也说：“明时积水潭，常有好事者联十余牀，携都篮酒具，铺氍毹其上，轰饮冰凌中以为乐。”盘盒都篮一回事，是明人出游的必备神器。“都篮”最早见于唐代陆羽《茶经》，主要是装茶具的。到了明代，发展为提盒，大幅度扩容。高濂曾自制“提盒”，可谓高配。他的提盒分上下两层，“式如小厨”，“远宜提，甚轻便，足以供六宾之需”。下层作小仓，可以“装酒杯六、酒壶一、

箸子六、劝杯二”，上层分六格，“以四格，每格装碟六枚，置果肴供酒觞。又二格，每格装四大碟，置鲑菜供饌箸”。此外，又自制“提炉”，类似提盒样式，可以煮茶、温酒及熬粥。用一副担子挑着提盒和提炉，就可以出发了。钱唐人许次纾著《茶疏》，其中有“游山具”：“备诸器具，精茗名香，同行异室，茶罍一，注二，铤一，小瓯四，洗一，铜炉一，小面洗一，由副之。随以

香奁小炉香囊七箸以为丰肩，薄瓮贮水三十斤，为半肩足矣。”不仅装茶具，还能装酒具、香具，容纳更多样化。

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，为紫檀木质，可折叠，展开为桌，合闭为箱。可以放置64件套小巧精细的文房四宝及文杂器具，还包括宫廷画家周鲲的设色山水画小手卷和山水小册页及《类苑丽语》上下二册。在明代折叠桌就出现了。高濂《遵生八笺》

说，出外旅行建议携带两张叠桌”。一张大桌作饭桌，“作二面折脚活法，展则成桌，叠则成匣，以便携带。席地用此抬合，以供酬酢。”另一张小桌作供桌。“以水磨楠木为之，置之坐外，列炉焚香，置瓶插花，以供清赏”。

说到折叠家具得说胡床。胡床，有靠背的叫交椅，没靠背的称交机，还可叫马扎。胡床有两大贡献。一是改变了古人的坐姿，从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，唐人称之为“逍遥座”。二是“敛之可挟，放之可坐”（《资治通鉴》），给古代家具带来折叠的设计思路。

一把交椅的革命性

胡床，东汉传入，受到汉灵帝喜欢。隋代，胡床改称交床。李白“床前明月光”中的“床”，一说就是胡床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上的交椅，结构简洁，椅子坐下设交足，并有横向靠背。《诚斋诗话》中讲过苏轼的一个笑话。苏轼过润州，太守高会宴请他。席间歌伎唱“惟有一杯春草，解留连佳客”，苏轼接下句“却留我吃草”。“诸妓立东坡后，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，胡床遂折，东坡堕地，宾客一笑而散”。或是

这事闹的，如在《金瓶梅》中这种有靠背的胡床就叫作了“东坡椅”。

“太师椅”也是交椅。《贵耳集》中说，“太师椅”因秦桧坐过而得名。又一说认为来自文徵明的“文太史椅”。这把椅子后归文徵明曾孙文震孟所有。崇祯帝时文震孟入内阁拜相，尊为太师，所用椅子称太师椅。《金瓶梅》中

已有太师椅的说法。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说：“（交床）携以山游，或舟中用之，最便。”如果带“太师”去旅行，这个“太师”不能是秦桧。

最革命性的思路是，交椅被明人改造为飞行椅。《吴县志》载，明末清初时徐正明制成了人力驱动的车，其外形如太师椅，“下有机关，齿牙错

合。人坐椅上，以两足击板上下机转，风旋疾驰而去”，“离地尺余，飞渡港汊不由桥”。这个发明应名列明代器物发明的第一把交椅，其真正践行了东坡先生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畅想。

清代李渔设计过凉机。凉机机面有如方匣，上覆方瓦，“先汲凉水贮机内，以瓦盖之，务使下面着水，其冷如冰，热复换水，水止数瓢，为力亦无多也”。《金瓶梅》提及“凉机儿”，在西门庆家葡萄架下，李渔不知是否受此启发？

观雪庵是纸帐篷

帐篷自古有之，《墨子》载“幔幕帷盖，三军之用”。古人一般夜宿于舟船、逆旅或古寺，露营常谓之“野宿”，野宿大多不得已。“处处浮家成野宿，时时策蹇作山行”，陆游的豁达少见。古代有没有民用露营帐篷？一个例子见于《武林旧事》，宋孝宗陪同太上皇宋高宗去钱塘观潮，临时搭建五十间观潮屋，民众有样学样。高濂载“观雪庵”造法，是纸帐

篷。“长九尺，阔八尺，高七尺，以轻木为格，纸布糊之，以障三面。上以一格覆顶面，前施帷幔，卷舒如帐。中可四坐，不妨设火餐具，随处移行，背风帐之，对雪瞻眺比之毡帐，似更清逸。施之就花，就山水，雅胜之地，无可不也，谓之行窝。”“观雪庵”最早出自沈括之

手。到了清代，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记有“就花居”，也是纸帐篷。依学者孟晖的说法，观雪庵的设计来自唐宋的纸阁。纸阁置室内，用于冬天取暖，妙处是在其中焚香，香气久聚不散。

至于行窝，典出北宋理学家邵雍，其居室名为安乐窝。邵雍好交友，友

人仿安乐窝造屋接待邵雍，称为“行窝”。如今各地民宿，因为露营热而搭建帐篷揽客，很像行窝的思路。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载，苏轼任汝阴太守时，“作择胜亭，以帷幕为之，世所未有也”。宋代《云笈七籤》曾记武夷仙人传说，武夷山仙人“武夷君”每年设宴，“置幔亭，化虹桥通山下”，因此武夷山又称“幔亭”。择胜亭的设计和幔亭的传说异曲同工。

奢华背后的时代变局

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写“虎丘中秋夜”，万人合唱“澄湖万顷”，可以遥想晚明当年的露营盛况：“天暝月上，鼓吹百十处，大吹大擂，十番铙钹，渔阳掺挝，动地翻天，雷轰鼎沸，呼叫不闻。更定，鼓铙渐歇，丝管繁兴，杂以歌唱，皆‘锦帆开、澄湖万顷’同场大曲，蹲踏和锣鼓丝竹肉声，不辨拍煞。”晚明士风“纵情声色”、“物欲横流”，原因在于：一是商品经济发展。明中叶以后

社会渐以侈靡为尚，贱商之传统被遮掩。特别在江南，“其俗不儒则贾，相代若践更”。文人审美走向精致化，如王骥在《寓圃杂记》中说的“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”。历史学家卜正军在《纵乐的困惑》中论及：“当每个人都开始追逐原本应属于士绅阶层的東西时，这些士绅试图以不断修改审美规则来

维护他们优越于后来者的特权地位。”二是晚明政局衰败。万历时顾允成始用“天崩地拆”来形容。庙堂之路越来越窄，士人便在山水之中开拓精神空间。

三是明末西学东渐。西方传教士来华，打开了明代士人的视野。徐光启和利玛窦编译《几何原本》，王微与

瑞士传教士邓玉函编译《远西奇器图说》。士人阶层重道轻器的固有思维开始转变，实学思潮抬头。

宋人曾给茶器加官晋爵，管茶帚叫“宗从事”、茶磨称“石转运”。明人则把竹茶炉称为“苦节君像”，而把都篮尊为“苦节君行省”。“苦节”指竹，“行省”指游具。国事维艰，士人追求物欲，既为心境的纾解，亦是气节的自况。只不过有人困于物内，有人超然物外罢了。来源：北京晚报